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黃人《中國文學史》之編纂概觀

— 兼及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 —

溫慶新*

<目次>

1. 引言
2. 黃人《中國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吸收
3. 黃人《中國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揚棄
4. 20世紀初期文學史編纂的若干現象漫說

1. 引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自問世以來，廣受彼時文人學士的重視。乾嘉之時，「諸儒」即使對《四庫提要》「間有不滿」，卻「不敢置一詞，微文諷刺而已」，因其為官修而被尊為圭臬，「諸儒」未敢越雷池半步；道咸以降，學者對《四庫提要》之態度則發生重大變化，出現毀譽參半之情形：「信之者奉為三尺法，毀之者又頗過當」，從而促使學者逐漸較為客觀地對待《四庫提要》優劣之種種；光宣以降，則出現諸如《禁書目合刻》、《四庫全書簡明日錄標注》、《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等研究《四庫提要》的專述¹⁾；民國以降，對《總目提要》之研究愈發熱忱，學者之衆、研究之深均前所未有，進而形成「四庫學」研究之盛況。不過，學者對《四庫提要》之態度及認識則多有差異。對此，余嘉錫說到：「一二通儒心知其謬，而未肯盡言，世人莫能深考，論學著書，無不引以為據。《提要》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並為一談；

* 湖南師範大學 文學院 中國古代文學 碩士研究生。

1)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錄》，中華書局，1980年，頁48-49。

牢不可破，鮮有能自出意見者。逮至近代，高明之士，自持其一家之說，與《提要》如冰炭之不相容，遂厭薄其書，漫以空言相詆毀，亦未足以服作者之心也²⁾。據此看來，《四庫提要》被學界奉為圭臬，影響著彼時學術變遷之大勢；即使見有他異者，亦以之為辯駁對象。道咸以降之目錄著述，如范懋柱《天一閣書目》、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等，其編纂體例、乃至著錄標準，悉遵《四庫提要》。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凡例》云：「著錄家分別部居，互有出入。《隋志》而後，門目繁多。今謹遵《文淵閣四庫全書》例編次，雖當時館臣配隸，容有未當之處，亦不敢妄為立異」，代表著彼時目錄學家之態度³⁾。又如，張之洞《輜軒語》(1875)曾對彼時四川學子語曰：「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四庫提要》為讀群書之門徑⁴⁾」。可見，從某種意義講，《四庫提要》已成為學者著書立說的必備書籍。在這種情況下，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欲有效地把握文學發展之流脈，其最直接、最有效的選擇則是借助能較為精準梳理傳統學術變遷大勢的目錄學著述，以便把握中國文學發展之大勢。而《四庫提要》所體現出來的學術思想及成就足以勝任此要求，且《四庫提要》被學界奉為圭臬，成為彼時學士求「學問門徑」之最佳選擇。基於此，近代學制變革所制定的各《章程》有關各科類之課程設置，均要求編纂者從《四庫提要》取經，以精確把握古代學術源流。如《奏定大學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分大學堂凡八科，其中「經學科大學」之「周易學門科目」所設科目有「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經部易類」；該《章程》要求「治經及理學者」開設必要課程後，還應設「各補助科學科目」，其中就有「四庫經部提要(看《四庫提要·經部·本經》一類，能參考他經尤善)」等科目。「文學科大學」之「中國史學門」所設科目有「四庫史部提要」，「中國文學門」所設科目有「四庫集部提要」、「漢書藝文志補注、隋書經籍志考證⁵⁾」。而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與近代學制變

2) 同上，頁50。

3) 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刻本。

4)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頁14681。

5)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349-355。

革及其所要求之科目與課程設置存有很大關係；從某種意義講，這時期的文學史編纂則是近代學制變革的衍生物。在「內因」與「外勢」的雙重推動下，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者必然會轉向《四庫提要》，以實現他們編纂文學史之目的意圖。雖有學者注意到《四庫提要》對文學史學史的早期發展產生過影響，但對《四庫提要》如何影響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兩者之間如何雙向互動等問題的探討，幾無涉及。有鑑於此，本文擬以黃人《中國文學史》為探討對象，結合上述問題，以期對《四庫提要》與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之間的關係予以合理描述。

黃人《中國文學史》與欽定、奏定《大學堂章程》及《高等學堂章程》之間存有緊密關係，黃著文學史在很大程度上遵循各《章程》之精神旨歸而編纂。只是在具體操作上，黃人以自身對中國文學之見解及所接受的西學知識為主⁶⁾。而近代學制變革所制定的各《章程》，往往與《四庫提要》保持著極大關聯性。《奏定大學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分大學堂凡八科，其中「經學科大學」之「周易學門科目」所設科目有「欽定四庫全書提要經部易類」；該《章程》要求「治經及理學者」開設必要課程後，還應設「各補助科學科目」，其中就有「四庫經部提要(看《四庫提要·經部·本經》一類，能參考他經尤善)」等科目。「文學科大學」之「中國史學門」所設科目有「四庫史部提要」，「中國文學門」所設科目有「四庫集部提要」、「漢書藝文志補注、隋書經籍志考證」⁷⁾。各《章程》因重視「經史」傳統於俾補人倫道德、踐行「教育致用」之重要性而強調各學堂之課程開設應承繼傳統學術。「中國文學門」設目錄學課程則為開啓承繼傳統學術之入門。黃著文學史與各《章程》之關係，表明其完全具有吸納《四庫提要》批評理念及批評方法之可能。又，《小說小話》云：「中國歷史小說，種類頗夥，幾與《四庫》乙部所藏相頡頏。然非失之猥濫，即出以誣謾，求其稍有特色者，百不得一二。惟感化社會之力則甚大，幾成爲一種通俗史學」⁸⁾，知黃人對《四庫提要》當有所涉獵。黃人著《國朝文匯序》，對乾隆朝「繼世列賢，

6) 溫慶新，〈黃人《中國文學史》與《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之關係發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

7)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頁349-355。

8) 江慶柏、曹培根編，《黃人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309。

懋學右文，兩舉詞科而駿雄遊殼，宏開四庫而文獻朝宗」之舉頗多嘉許⁹⁾，則黃人或曾學於「四庫」。《中國文學史·總論·歷史文學與文學史》云：「我國舊學，唐宋以下，大率分爲性理、考據、詞章三派，而最錄簡冊者，又分爲經、史、子、集四部，獨以詞章與集部屬諸文學，其餘則閉門自貴，不屑就文學之範圍」；而《略論·文學之種類》對文學肇始之論起于《周禮》，爾後言孔子及《論語》，以言文學、「文學權」、「行政權」之統合變遷，認爲「尊王法聖」是中國文學發展之特性¹⁰⁾。由此可見，黃著文學史重視對經史子集四部之學的書寫。而這種書寫前提須對傳統「四部之學」有清晰之認識，則黃著文學史吸納傳統目錄及批評著述之集大成的《四庫提要》亦順理成章。藉此，探討《四庫提要》對黃著文學史編纂之影響，則頗有必要。

2. 黃人《中國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吸收

黃人《中國文學史》對《四庫提要》的吸收主要集中于是從宏觀層面。而這種層次的吸納則基於以下兩個前提：認可傳統文化之心理與「經世致用」之目的。儘管黃人曾廣泛學習「西學」科識，但因其曾入私塾，受過嚴格訓練，對經史子集四部之學均有很深造詣。金鶴狃《黃慕庵家傳》云：「其爲教習十餘年，所得不下萬貫，卒之日家無餘資，獨有書數千卷。於書無所不讀，經史之學及小說，今之名學、法律、醫藥之說，催眠之術，莫不究。喜言佛氏，以爲聖人之至」¹¹⁾。這種經歷及喜好足以促使黃人認真對待中西學術之優劣，並做出切合晚清時勢及黃氏思想意圖之選擇。縱觀黃人所撰之文，其所體現之思想意圖的確導向認同傳統精髓文化之一面。《小說小話》認爲小說「感應社會之效果」獨具特性，可與社會風尚「互爲因果」¹²⁾。《國朝文匯》所選亦多爲可資啓「政教風尚」及「學術思想」者，編匯之由則據傳統文化之

9) 同上，頁291。

10) 黃人，《中國文學史·略論·文學之種類》，國學扶輪社，1911年。

11) 江慶柏、曹培根編，《黃人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365。

12) 江慶柏、曹培根編，《黃人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318-319。

精髓以「俾後人聽者其際」，觀政教風尚與學術思想之「大概」¹³⁾。《中國文學史·總論》雖對古文學「不誠」現象予以批判，但認為文學既為載道垂訓之具，在剔除「不誠」成分之後，仍可垂「人事之鑒」、明「興衰治亂因緣」¹⁴⁾。這些思想可大略說明黃人認可傳統文化之心理。而《四庫提要》對中國數千年以來思想及學術變遷之大勢的梳理，便於黃人據此汲取所需。以上所述，亦可見「經世致用」是黃著文學史編纂之重點。黃著文學史參考《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等有關「中國文學」之設置，將「經學」、「小學」傳統納入文學史視域，其基本立足點則是「經世致用」。《總論》之《文學之目的》所言「文以載道」、「修辭立誠」，《文學史之效用》言及文學史編纂有利於「謀世界文明之進步」、「求將來、知遠因、明近果」等，這些足以說明「經世致用」是黃著文學史編纂的重心之一。因為它們有助於實現黃人藉以維繫人倫道德、啓智圖強等目的意圖。而《四庫提要》對「古之聖賢，學期實用」之經世思潮予以諸多關照，對荀子、葉適、黃宗羲、王夫之等力主「外在事功」以「明道救世」之經世觀及孟子、朱子、王陽明等力主「正心誠意」為經世之本的心性派，分別予以揭示，力主「切於人事」以繼往開來，勵「實行」以激「人心」。這種精神層次之目的要求正是黃著文學史、乃至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的主要任務之一。黃人對傳統文化(精髓)之認同與「經世致用」之思想的融合，必然促使其尋求傳統文化中可「致用」之成分以踐行其編纂文學史之目的。因此，《四庫提要》所體現出來的「經世致用」思想、晚清所面臨的動盪局勢、黃人對傳統文化之認同心理及其編纂文學史之目的，這些因素的綜合促使黃著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批評理念及批評方法必然有所吸收。

而黃著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批評理念的吸收，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其一，從宏觀角度把握歷史、文化及學術變遷之大勢，尋求變遷過程中之文治教化、人倫道德等傳統以「經世致用」。《四庫提要》在「變通」觀指導下探討學術變遷之大勢，認為歷史總是「推陳致新」、「造化新新不停之義」(《景嶽全書》)¹⁵⁾，並以是否合乎文治教化作為評判學術流派及各家學說之重點；同時，《四庫提要》又認為「聖

13) 同上，頁290-292。

14) 黃人，《中國文學史·總論·文學史之效用》，國學扶輪社，1911年。

15) 紀昀等，《四庫總目提要》(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頁1361。

人之道，與時偕行」(《遜志齋集》)¹⁶⁾，雖「三代以前，文皆載道；三代以後，流派漸分」(《斯文正統》)¹⁷⁾，但總以「切於人事」、「明道救世」為最，故《四庫提要·凡例》云：「聖賢之學，主於明體以達用，凡不可見諸實事者，皆屬卮言」、「庶讀者知致遠經方，務求為有用之學」¹⁸⁾。黃著文學史既認同「經世致用」思想、認可傳統文化之精髓，其對古代學術變遷之探討亦著眼於文學史載道垂訓之圖，認為「三古以上，政治權、宗教權、教育權皆兼握于君主」(《略論·文學之起源》)，而後文學權與「行政權」逐漸分離(《總論·文學之種類》)，致使「文以載道」多所華離。儘管黃著文學史以「文學之自由」為評判的標準之一，但其對文學自由權的肯定並未偏離文治教化及「啓民智」之目的意圖(詳見下文)。《總論》、《略論》等章節則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分「文學全勝期」、「文學華離期」、「文學曖昧期」、「文學第二曖昧期」等不同階段，對中國文學發展之總體脈絡予以宏觀把握；之後，第三篇《文學之種類》、第四篇《分論》在此宏觀把握之基礎上，展開詳細論述，從而使得黃著文學史之宏觀概況與微觀分析得以相協調。

黃著文學史吸收《四庫提要》批評理念的另一表現，則是對「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批評觀的承繼。這是包括《四庫提要》在內的傳統目錄學著述所遵循的原則之一，它有助於把握「文章流別，歷代增新」、「儒者著書，往往各明一義，或相反而適相成，或相攻而實相救，所謂言豈一端，各有當」等複雜情況¹⁹⁾。此觀念流至《四庫提要》時，因四庫纂修官大多為通儒達碩、見識廣博，乾隆帝傾一國之力為之，故其成為傳統目錄學及批評著述之集大成者。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序錄》稱之「剖析條流，斟酌古今，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故曰自《別錄》以來，纔有此書，非過論也。故衣被天下，沾溉靡窮，嘉、道以後，通儒輩出，莫不資其津逮，奉作指南，功既鉅矣，用亦弘矣」²⁰⁾。黃人《中國文學史》亦以為「指南」，承繼著此種批評觀。關於「辨章學術」，《總論》之「文學之種類」、「文

16) 同上，頁2285。

17) 同上，頁2719。

18) 同上，頁33。

19) 紀昀等，《四庫總目提要》(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頁33。

20)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1980年，頁48-49。

學全勝期」、「文學華離期」、「文學曖昧期」、「文學第二曖昧期」等章節已有體現，只是這裡所辨「學術」則側重于強調文學發展如何突破「專制」以達「自由」之過程²¹⁾。而「考鏡源流」集中體現於第四篇《分論》中。該篇凡四章，分別為文學之起源、上世文學史、中世文學史、近世文學史；除第一章外，其他各章均先論述上世、中世、近世各時期的文學發展梗概，以考辨各個時期之學術源流。如「中世文學史」云：「曆周、秦、兩漢，而文學之所謂真且善者，蓋幾乎造其極際而蔑以加矣。顧非真造極也，上制於統一之政，下篤于尊古之習，雖有進乎此之真之善，固不敢出示諸世。久之，且並其特別真善之思想，而亦漸至剷除。然人心與世運進化同途，寧有社會之萬事皆進，而文學獨衰退者。故真善之思想，雖困於外界種種阻力，而尚有美之一部分，可以從容展布於其間，而辟無數之新境界，此中亦有天然之力為之斡旋，即當局者亦不自知也。論政談道之文，備于三古，而屈、宋前喁，揚、馬後於，詞賦之盛，幾與六藉百家抗衡。魏晉六朝，清詞麗句，儷萼駢跗，又使兩京有汗尊土劍之愧。推之三唐之雜體、散文詩文，兩宋之理學、詩余，金元之小說、樂府，明之傳奇、制藝，皆縋幽鑿隱，為前人履齒所未經。故就一方面言，則古渾厚而今浮薄，古雄健而今孱弱，古正大而今煩瑣；而別就一方面觀，則古拙而今巧，古樸而今華，古疏而今密。兩兩相衡，不必謂黼黻之華，必絀於卉服；琴瑟之制，盡乖於讓音。藥石膏梁，各適其用；桑麻桃李，共有其天。當合美，而不可偏置也。夫明道德、言政治，則誠不可雅鄭同律、涇渭合流。若文學則大部偏於情感，固無庸挾性法以毛求」，所論文學之鏡流，頗切中肯綮²²⁾。據此，「辨章學術」與「考鏡源流」二者緊密融合在以「致用」意圖為主導的黃著文學史中，成為黃著文學史中西融通的重要表現。可見，黃著文學史對《四庫提要》、甚或對傳統學術論述(如「經學」)之批評理念，多有承繼。而這種承繼則是在認可傳統文化(精髓)及「經世致用」目的之基礎上進行的，因而承繼點主要表現於精神層次及價值層面的觀念之間的相似性。當晚清時勢變動及黃人目的意圖被強化後，則黃著文學史承繼這種批評理念的同時，必然會導向揚棄之一面。

不過，在吸納《四庫提要》批評理念之基礎上，黃著文學史對《四庫提要》具

21) 溫慶新，〈有關黃人《中國文學史》的編纂體例與分期問題——兼論以章節體編纂文學史之利弊〉，《中國學論叢》，2010年2月，第27輯，頁350-364。

22)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中世文學史》，國學扶輪社，1911年。

體的批評方法亦有所吸收。傳統目錄體制含篇目、敘錄、小序、版本序跋等，目錄之書分「部類之後有小序，書名之下有解題者」、「有小序而無解題者」、「小序解題並無，只著書名者」三類²³⁾。《四庫提要》則屬既有小序又有解題之類，《提要凡例》云：「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並改錄，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注案語，以明通變之由」²⁴⁾。雖然黃著文學史之編纂體例採用的是章節體模式，但在具體論述過程中亦不乏含吸納《四庫提要》體例之情形。黃著文學史第一篇《總論》、第二篇《略論》之安排大略等同於「總序」，其目的亦是概述文學史之「源流正變」；第三篇《文學之種類》相當於《四庫提要》之分部目類，以申明文學史編纂的書寫對象；至於上文以提到的《分論》及其二、三級章目的設置，則相當於「小序」，此篇論述各朝代文學或文類之前大多有引論、末附結語(甚或有明標「緒論」、「正義」者，然亦非所有章節均如此)，其功用不僅含「析條目」，亦有「考鏡源流」之用；至於「附注案語」之例，黃著文學史亦有所體現，如《分論·中世文學史·魏晉文學》論述「兩晉詩賦」，附「晉窈眇文(清談、神仙家言)」，聚類相從而「明通變之由」。可見，黃著文學史採用章節體模式的同時，又據傳統目錄體制予以改良，使得該編纂模式更適宜探討中國文學之流變。此論可與拙稿〈有關黃人《中國文學史》的編纂體例與分期問題——兼論以章節體編纂文學史之利弊〉之有關論述相發明²⁵⁾。上述事實是黃著文學史從宏觀層面承繼《四庫提要》批評方法之實例。現從微觀的操作層面的事例，略以言說。《四庫提要》運用最廣泛的批評方法有諸如「知人論世」、重視分源別派的學脈辨識等等。這些法則亦是黃著文學史所擅長。如評判屈原著述時，先論述屈原與楚王「相勞苦困乏」、遭奸臣欺詐之境遇，致使其陷入「憔悴憂傷」的痛苦心理；爾後才評其著述，如稱《離騷》：「此自述也，即可作其小傳讀。其情如《關雎》，其氣如《逍遙遊》，名之曰經，多乎哉！此篇為老、莊濫觴」²⁶⁾。又如，申述明代文學之梗概，就注重其中的派別學脈特性，云：

23)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巴蜀書社，1991年，頁2。

24) 紀昀等，《四庫總目提要》(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頁32。

25) 載《中國學論叢》，2010年2月，第27輯，頁355-364。

26)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上世文學史·文學全盛中期》，國學扶輪社，1911年。

「明初文學，各標一幟，不相沿襲，亦不相菲薄，雍容揖讓於壇坫之上，蓋有冠裳玉帛之風焉。西涯雖為殿閣所宗，而絕不高自位置，欲籠罩一世。至朝局一變，士大夫各立黨派，而影響於文學界。於是北地、信陽，首以呆論奔走天下之士；而弇州、滄溟繼之，勢力益張。至其末流，而操槩卷首，見高名之易居，習俗之易欺，遂人人有領袖風騷之想。公安之俳優而成一派，竟陵之幽躁而成一派，世變日亟，文運亦日衰。幸有云間、虞山起而振之，以收四五朝紛紜之局。不然，則打油鉸釘之儔，皆欲出而執文壇之牛耳矣！然其間若震川、臨川、天池之倫，則砥柱洪流，抱琴太古，如鵬鳥揚扶搖之上，而坐視離鷄之爭粒，則豪傑之才，誠不絕於世。而牢籠之術，亦如叔季政界，但能制駑駘下材，而蘭筋天骨，非易入閑也」²⁷⁾。此類例子不勝枚舉。概而言之，黃人在編纂文學史的具體操作層面，對《四庫提要》之具體批評方法亦有所借鑒。可見，黃著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吸收，不僅表現在二者具有相通的精神內涵及相似的目的性，又體現於對《四庫提要》之批評理念的吸納中，而且分別從宏觀與微觀這兩種層次予以具體吸收。這種承繼與黃著文學史對「西學」之吸納相消融，成為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之特殊時代內涵的重要表現。

3. 黃人《中國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揚棄

黃著文學史不僅承繼《四庫提要》之批評理念及批評方法，同時因黃人之價值觀及所撰文學史之目的意圖(因教會學校教學需要而編纂文學史²⁸⁾)、乃至晚清時勢變動等因素之綜合，致使黃著文學史在承繼之同時必然要對《四庫提要》進行揚棄，以切合其所編纂意圖。粗略概觀，黃著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揚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黃著文學史在撰寫中國文學發展時，以各種文體為書寫的主導對象，以時間為

27)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近世文學史·文學曖昧期》，國學扶輪社，1911年。

28) 詳見拙稿，〈黃人的西學科識與來源蠡測〉。

序而加以展開。這與《四庫提要》之論述模式有所區別。如黃著文學史論述「魏晉文學」，分三國文學代表、三國雜文(作品選讀)、兩晉文學代表、晉人矯俗文(作品選讀)、兩晉雜文(作品選讀)、兩晉詩賦(作品選讀)諸節目，論述「唐代文學」分唐初盛文學家代表、唐中晚文學家代表、唐駢文(作品選讀)、唐散文(作品選讀)、唐詩(作品選讀)、唐新文體(含試律、詩餘、小說)諸節目，論述「兩宋文學」分緒論、北宋文學家代表、北宋散文(作品選讀)、兩宋詩(作品選讀)、兩宋詩餘家人名表、南宋文學家代表、南宋散文(作品選讀)、兩宋新文體(論賦、四六)諸節目，論述「元代文學」分元文學代表人名、元文(作品選讀)、元詩(作品選讀)、元詩餘(作品選讀)、金元人樂府目、樂府格式諸節目，論述「明代文學」分明初文士受禍略記、明前期文學代表、明雜文(洪武至正德，作品選讀)、明韻語(洪武至正德)、明後期文學代表、明雜文(嘉靖至崇禎，作品選讀)、明次期詩錄(附詩餘，作品選讀)、明之新文學(曲本、明人制藝、明人章回小說)諸節目。而這種章節模式及論述方法正是由西入傳之各國文學史所特有。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曾言及：「各國文學史皆錄詩人名作講義，限於體裁，此篇惟舉其著者述之，以見詩文分合之漸」²⁹⁾。彼時中國可見到的日本人所寫的《中國文學史》，如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等，均以時間為序，採用分體形式組織文學史之編纂。並且，這種書寫以「錄詩人名作講義」之方式組織，此即黃著文學史所採用之典型方式。黃著文學史第四篇《分論》之相關論述，往往以各朝代之名人名作為講課中心，可知黃著文學史已吸納上述之編纂方式，這與《四庫提要》所體現之批評方法有著本質之別。

同時，黃著文學史「錄詩人名作講義」是以文學分體為討論基礎的。檢視黃著文學史所涉及的文學樣式，有命、令、制、詔、敕、策、書諭、諭告、璽書、敕文、冊、制誥、敕令(附教)、禦(筭、內批)、教、表、箋啓、奏議、頌贊(附雅、封禪文、評)、贊、箴銘、檄移(附露布、符)、移、策對、問對、批判、序、引、題跋(附讀、案)、注疏(附訓詁)、傳記、碑銘(附墓誌銘、幽宮契)、祝禱(附盟書、祝嘏文、祭文)、哀誄(附哀辭、吊文、挽歌)、述狀(附年譜、壽啓、哀啓)、論說(附辯解、釋銓、告誡、

29)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陳平原輯：《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32。

問對、七、連珠)、經義(附八股、經解)、譜錄(附版檔)、讖緯、謠諺(附格言)、騷賦,兼及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樣式,可謂古今涵蓋、雅俗皆備,兼顧中國歷史發展的各種文體樣式,且能予以較為合理之評價。尤其是,黃著文學史對「稗官小說」之重視,打破《四庫提要》鄙薄稗官小說家言語之勢態。儘管早在諸如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等日著文學史中,通俗小說、戲曲已入文學史視野,但在彼時國人所著文學史中,黃著文學史可謂開先河。黃著文學史論述「稗官小說」者,有「文學全盛期之「古小說(《山海經》寄語、《穆天子傳》)」、「魏晉南北朝小說(作品選讀)」、「唐新文體(試律、詩餘、小說)」、「文學曖昧期之「明之新文學(曲本、明人制藝、明人章回小說)」等。這些論述不乏以審美意識作為評判標準,學界多有述及。但黃著文學史又說「社會風俗之變遷,人情之□澗,輿論之向背,反多見於通俗小說,且言禁方嚴,獨小說之寓言,十九手揮目送,可自由抒寫,而內容巨集富,動輒百萬言,莊諧互引,細大不捐,非特芻蕘補簡冊,又可為普通教科本之資料」³⁰⁾,將小說當作檢視社會風俗變遷、人情輿論之嚮導,以為「普通教科本」。可見,在黃人看來,這種審美批判並非以有意削弱教化意圖為代價,它是在「致用」思想指導下進行書寫的。就「致用」意圖而言,黃著文學史與《四庫提要》並無本質差異;二者的差異在於「致用」的針對對象及踐行手段的不同而已。黃著文學史將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樣式納入文學史視域,不僅受西傳之「各國文學史」的影響,亦與晚清時期將小說、戲曲等「通俗文學樣式」作為啓民智、救國難之先導的大背景緊密相關(即「文學界革命」、「小說界革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順勢而動之變革傾向。

不過,黃著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最大揚棄,當屬黃著文學史以全新之觀念審視中國文學的發展。黃著文學史借用大量外來思想,以全新的指導思想及批評理念來解構中國文學,並加以重新組合。這種特殊性在20世紀初期國人所著的文學史中,當屬特例。也就是說,黃著文學史對傳統學術之揚棄已突破單純的機械式的操作,而是據以精神層面的價值觀改造。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黃著文學史以「西學」之進化論、自由平等思想來組織文學史之編纂。黃著文學史認為文學發展是不斷「進

30) 黃人,《中國文學史·分論·近世文學史·文學曖昧期·明人章回小說》,國學扶輪社,1911年。

化」的，這是文學發展之「天演公例」；以「進化論」組織中國歷史及文學發展的「一代有一代之精神」、「一代之特色」，從而有效地把握中國文學發展之「形」與「質」、考辨學術變遷之宗派流別等衍變過程³¹⁾。可以說，近代科學思潮對黃人《中國文學史》產生過極大影響，它成爲黃著文學史思維觀、認識論及方法論的重要來源；尤其是進化論的引入，極大地嚴謹黃著文學史之結構及理論性，成爲該文學史的一大特色；同時，黃著文學史將文學發展突「專制」壓迫而達自由平等之過程當作中國文學「進化」之重中之重，予以特寫。其實，這與黃著文學史借用由西入傳之「章節體」模式建構中國文學發展有很大關係，是章節模式論述之「以論帶史」、「以論代史」所圈禁之思維模式的必然反應³²⁾。這種思維模式導致黃著文學史對傳統學術之揚棄並非單純局限於事實的機械替代或事例的簡單羅列，而是著重以論述者之「論」去解構傳統學術及其背後之目的意圖。

據此看來，黃著文學史吸納《四庫提要》之意圖，在於它在某種程度上符合黃著文學史所要求之「致用」意圖。據《總論·文學史之效用》言文學史之效用在於「俾國民有所稱述，學者有所遵守」、「俾後生小子」³³⁾，《重集經費啓》所言「今日之中國，非閉關垂堂之中國，而兀立於民族競爭世界漩渦中之中國也。競爭機力，人才爲重。製造人才，則在教育；教育工廠，則在學堂」³⁴⁾等語，可知黃著文學史所強調之「致用」意圖首先表現爲教育致用，以「啓民智」、維繫社會人倫道德而興國邦，進而達到黃人所希望實現國富民強之政治意圖³⁵⁾。這種意圖性與《四庫提要》所處時代之「致用」意圖雖均導含人倫道德之一面，但二者側重點則多所不同。正是晚清時代變遷對「致用」意圖提出了新要求，致使黃著文學史在承繼《四庫提要》等傳統學術之同時，對其中不合晚清時勢變遷之某些批評理念進行揚棄、乃至改造。何況晚清時勢變遷對維護人倫道德之要求比《四庫提要》所處時代之情形來得重要與緊迫。故而黃著文學史對其加以揚棄，亦無可厚非。誠如黃人所言「今日之中國，非

31) 溫慶新，〈對近百年來黃人《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反思〉，臺灣《漢學研究通訊》，29卷第4期。

32) 溫慶新，〈有關黃人《中國文學史》的編纂體例與分期問題——兼論以章節體編纂文學史之利弊〉，《中國學論叢》，2010年2月，第27輯，頁339-364。

33) 黃人，《中國文學史·總論·文學史之效用》，國學扶輪社，1911年。

34) 江慶柏、曹培根編，《黃人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294。

35) 溫慶新，〈有關黃人研究的若干意見〉，《江蘇電視廣播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頁53-57。

閉關垂堂之中國」，時勢變遷對「致用」意圖所提出的新要求，恐怕是導致黃著文學史以「致用」意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尋求對《四庫提要》之承繼，亦因二者「致用」對象及踐行手段之不同而使黃著文學史對《四庫總目》多所揚棄之根由。這些因素促使黃著文學史對《四庫總目》之揚棄，當側重於價值層面的觀念變革，從而使得黃著文學史與《四庫總目》之關係要比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與《四庫總目》之關係來得隱晦。

綜上所述，黃人《中國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吸納主要表現在二者精神層次及價值層面的觀念之間的相似性。而這種相似性又因黃著文學史強調「一代之精神，形式可學，而精神不可學」(《分論·上世文學史·文學之胚胎》)等價值理念之作用，且因晚清時勢之特殊及黃人價值觀之多樣性，致使黃著文學史對《四庫提要》又多所揚棄。從現象的表層統計看，黃著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揚棄要比吸納來得明顯，亦來得深刻。不過，黃著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吸納與揚棄並存的事實，一方面表明黃著文學史存在「中西融通」之一面，另一方面則表明「開民智」、維繫人倫道德之目的意圖主導著黃著文學史的編纂。這種現象大致反映出20世紀初期之文學史編纂的意圖傾向性，代表著彼時有志之士嘗試文學史編纂所作的艱辛努力。

4. 20世紀初期文學史編纂的若干現象漫說

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的編纂處於動盪不已的時代環境中，這種動盪的時局及其所提出的新的時代需求，最終決定該時期的文學史編纂不可能完全恪守傳統，亦非舍本求末地簡單地照搬「西學」。實用意圖最終決定什麼樣的思想及方式可以順應時勢需求，它們就將最終被推上歷史舞臺。清末民初的錯綜複雜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民族矛盾、階級矛盾等利益衝突的事實，這些因素的雜糅促使該時期的任何學說都不可能離開政治意圖而以「純學術」的狀態存在。基於認同傳統文化之心

理與「經世致用」之目的，黃人《中國文學史》對《四庫提要》之批評理念及批評方法多有吸收。這種吸收主要體現於精神層次及價值層面的觀念之間的相似性。而黃人又因晚清時勢變遷及其編纂文學史之目的性，對《四庫提要》多有揚棄。可見，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大多存在「中西融通」之一面。檢視近代中西學術之消融鬥爭，其原因不外乎爭奪統禦某種政治意圖的主導權。由於人倫道德是古代文治傳統的立足點及歸宿點之一，因而這種調和或爭奪往往始於對彼時人倫道德規範之一面。而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所追求的學術致用之直接目的即是教育致用，以「開民智」、奮發圖強。因此，「開民智」、維繫人倫道德之目的意圖是該時期的文學史編纂的絕對主導³⁶⁾。在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中，不管是吸納《四庫提要》之批評理念及批評方法，還是吸收「西學」知識，都只不過是踐行此意圖的兩種不同手段而已³⁷⁾。這種操作思想實是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之共性，亦是晚清學者的普遍行爲。這說明20世紀初期文學史之編纂思想及實際操作，實不出晚清時代之大勢，是「經世致用」之時代思想的客觀表現。同時，它代表著彼時有志之士嘗試文學史編纂所作的艱辛努力，是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艱難地在「中學」與「西學」的兩難境地中夾縫求生的典型反映。

據此看來，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面臨的最大難題在於無任何可供借鑒的同類著述，即便是黃著文學史均曾參考過日本所著《中國文學史》，卻均未曾照搬日本同類著述。也就是說，此時的文學史編纂缺乏可供參考的範式模型。如何有效地切入對中國文學發展的書寫、同時尋求可供參考的評價體系與方法，則借助於傳統目錄之學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把握中國文學發展之大勢，成為彼時編纂文學史者最佳選擇。而作為傳統學術批評之集大成者的《四庫提要》所體現出來的學術思想、成就、乃至《四庫提要》的影響力，表明《四庫提要》足以勝任書寫文學史發展的要求。在這種內驅力與外助力的雙重推動下，彼時文學史編纂者借助《四庫提要》以建立文學史編纂的範式，或以「文體」為論述對象及重點、或據以時代分

36) 溫慶新，〈20世紀初期文學史編撰的幾個問題漫議〉，《中國學論叢》，2010年第28輯，頁137-172。

37) 有關黃人《中國文學史》所體現的「西學知識」，可參考拙稿〈黃人的西學知識與來源蠶測〉、〈近代科學思潮與黃人《中國文學史》之編纂〉二文。

期而依詩文爲論述對象，其所欲確立之範式儘管不盡相同，卻均反映著彼時文學史編纂者借助《四庫提要》尋求文學史編纂模型的努力過程。可見，《四庫提要》對形成文學史編纂的批評範式的重要性。

而《四庫提要》對確立文學史編纂範式的直接影響，表現在對文學史的編纂體例、批評方式等方面。《四庫提要》若干「凡例」所體現的批評方式，大多可以在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中得到印證。如「四部之首，各冠以總序，撮述其源流正變，以挈綱領。四十三類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詳述其分並改錄，以析條目。如其義有未盡，例有未該，則或於子目之末，或於本條之下，附注案語，以明通變之由」³⁸⁾，此種編纂體例及批評方法被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黃人《中國文學史》、竇警凡《歷朝文學史》，乃至陳曾則編《京師優級師範國文講義》(商務印書館1911年版)、張之純編《師範學校新教科書中國文學史》(商務印書館1915年版)、謝無量編《中國大文學史》(中華書局1918年版)等文學史著述所吸納，成爲這些文學史撰寫體例的絕對主導。又，「凡例」著書重視著者「爵裡」：「每書先列作者之爵裡，以論世知人；次考本書之得失，權衆說之異同，以及文字增刪，篇帙分合，皆詳爲定辨，「一人而著數書，分見於各部中者，其爵裡惟見於第一部，後但云某人有某書已著錄，以省重複」³⁹⁾，此方式亦被上文列舉的諸多文學史所接受，乃至仍被現今文學史編纂者奉爲圭臬。至於《四庫提要》「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諸多批評範式，亦大多被吸納爲文學史的批評方法。此類例子不勝枚舉，讀者稍加檢閱這些文學史著述，便可知曉。《四庫提要》強調辨章學術與考鏡源流以「求歸至當」爲最終歸宿，善其所長短⁴⁰⁾。而這恰恰是學術追求的佳境，文學史編纂者亦以此爲編纂歸宿。因此，基於學術體系內部的自律準則，文學史編纂者吸納《四庫提要》之編纂體例與批評方式的做法，實屬必然。

不過，據前兩節的論述可知，《四庫提要》對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的影響，更多體現於精神層次的價值、思想、觀念式承繼。最明顯的證據莫過於治文學史者編纂時所表露出來的文學史觀的混雜與反復。一方面，治文學史者吸納日本、

38) 紀昀等，《四庫總目提要》(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頁32。

39) 同上，頁32。

40) 同上，頁34。

乃至西方著《中國文學史》的同類著述，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純文學」理論視域下的某些外來文學史觀。另一方面，由於20世紀初期治文學史者受特殊的人生經歷、時代環境所限，他們無法突破傳統學術思想及價值觀的束縛，依舊奉之為圭臬，傳統的雜文學觀依舊是彼時文學史編纂的絕對主導⁴¹⁾。這些因素的雜糅導致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出現混雜而艱澀的文學史觀。治文學史者在吸納新的文學史價值評價標準的同時，又以《四庫提要》為代表的傳統文學史觀來改良外來的新文學史觀。其直接證據即是此時的文學史編纂均強調「小學」傳統對文學史編纂及教育致用的重要性，將「說文學」、「音韻學」、「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群經文體」、「各種紀事本末」等傳統學術編入文學史中，從而影響彼時的文學史編纂觀、認識論及方法論⁴²⁾。而彼時治文學史者對傳統學術的重視，在一定程度上與對《四庫提要》之思想及價值觀的吸納是分不開的。《四庫提要》所強調的價值觀念及涉及到的文化傳統是導致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出現價值模糊、觀念混雜的深層次原因。從學術衍變的一般規律看，學術思想及價值標準的轉變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漸進地演變；尤其是，價值標準的交替週期更顯漫長，存在「變」與「不變」爭奪及反復並存的階段。就20世紀初期所處的時代及其背景看，彼時學術衍變正好處在「變」之階段的前期，爾後出現的「學衡派」、「國故派」與「革命派」的爭鬥情形表明20世紀初期的學術衍變並非一帆風順，「變」與「不變」一直反復交替。更進一步講，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歷史發生的一連串事件，如「百日維新」、「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表明這時期的「變革」思想甚於「革命」意識；即使是反對變法的張之洞、李鴻章、曾國藩之流，亦強調變革對於維繫清廷統治、安撫細民的重要性。而這些主導中國社會進程的重要人物亦是彼時社會思想變化的主要推動者，他們更是對以《四庫提要》為代表的傳統價值觀及學術標準推崇備至。據此可知，他們所強調的循序漸進的變革意識當會左右彼時學術衍變的進程。這就必然促使他們對傳統精神的回歸及強化傳統精髓可適應彼時時代發展需要之部分。而作為傳統學術之典範者及其廣泛的影

41) 溫慶新，〈黃人《中國文學史》與《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之關係發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

42) 溫慶新，〈20世紀初期文學史編撰的幾個問題漫議〉，《中國學論叢》，2010年第28輯，頁137-172。

響面看，《四庫提要》不失為適合時代需要的一種上乘選擇。可見，彼時治文學史者對《四庫提要》之精神層面的承繼，既顯得順理成章，又是適應時代需要之必然舉措。要之，《四庫提要》對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的影響更多地體現於內在層次的思想精髓的延續，而外來的同類著述對彼時文學史的編纂則偏向於外在層面的思想形式的影響。儘管這兩者均屬於精神層次的影響，但二者所起的作用及影響範圍卻有本質之別，但以《四庫提要》之內在層次的影響更深刻。

綜上所述，20世紀初的文學史編纂對以《四庫提要》為代表的思想傳統及學術傳統的承繼大概屬有意之承繼，甚或帶有潛意識狀態之下意識舉動。從學界後來的文學史編纂情形反觀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亦可見對《四庫提要》之吸納、揚棄實是治文學史者所避不開的。治文學史之「變」與「不變」，亦可明顯區分。所「變」者，不外乎文學史框架、文學理論的異樣認識、甚至史論關係的多種意見；所「不變」者，除了作家生平、時代背景、創作環境，更在於文學發展的社會狀況、內部規律、文學作品的發生及存在形態的固定性。因此，即使我們對具體文學作品、乃至文學發展之整體狀況的認識含有多視角，但亦無法否定這種帶有固定性、形態性的客觀存在。《四庫提要》所體現出來的批評範式、體例、思想價值觀等等，畢竟大致反映出傳統學術(包括文學)發展的總體狀況，這也是種客觀存在。20世紀初期治文學史者注意到此中情由，並大致承繼此傳統；而後來治文學史者雖受多種價值形態及文藝理論的影響，但亦大致恪守此傳統，這些文學史著述或於批評方式、或於價值觀念、或二者兼及地承繼著。甚至，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60年代編纂的諸多文學史著述則直錄《四庫提要》之原文，以此作為該文學史評價之重要參考或主導依據。由此可知，《四庫提要》對中國文學史學史構建的重要性，循此思路不失為深入而全面把握20世紀初期的文學史編纂情形的重要途徑之一。

< 參考文獻 >

黃人，《中國文學史》，國學扶輪社，1911年。

紀昀等，《四庫總目提要》(整理本)，中華書局，1997年。

江慶柏、曹培根編,《黃人集》,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

璩鑫圭、唐良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陳平原輯:《早期北大文學史講義三種》,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

溫慶新,〈對近百年來黃人《中國文學史》研究的反思〉,臺灣《漢學研究通訊》,29卷第4期。

溫慶新,〈20世紀初期文學史編撰的幾個問題漫議〉,《中國學論叢》,2010年第28輯。

溫慶新,〈有關黃人《中國文學史》的編纂體例與分期問題——兼論以章節體編纂文學史之利弊〉,《中國學論叢》,2010年2月,第27輯。

溫慶新,〈有關黃人研究的若干意見〉,《江蘇電視廣播大學學報》,2010年第4期。

溫慶新,〈黃人《中國文學史》與《京師大學堂章程》、《高等學堂章程》之關係發微〉,《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1年第4期。

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刻本。

余嘉錫,《目錄學發微》,巴蜀書社,1991年。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1980年。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

< ABSTRACT >

According to the Recogni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psychology and "Jing Shi Zhi Yong"(經世致用) purposes, Huang Ren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was absorbed in the Criticism and the Critical Methods of the Si-Ku-Ti-Yao. This absorption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piritual level and value level of similarity among the concepts. And because of the varied situations in late Qing dynasty, Huang Ren rendered a selective development of Si-Ku-Ti-Yao. Therefore, due to the Si-Ku-Ti-Yao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t could be one important way with an in-depth a grasp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ompilation.

Keywords: the Si-Ku-Quan-Shu-Zong-Mu-Ti-Yao, Huang Ren's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Lin Chuan Jia's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early 20th century compilation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1.1.7	2011.2.10	2011.2.15	2011.5.20	2011.5.31